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十五編 第七冊

《武經總要》研究

李新偉 著

書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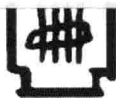
十五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7冊

《武經總要》研究

李新偉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武經總要》研究／李新偉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101〕

目 4+28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五編；第 7 冊）

ISBN：978-986-254-990-2（精裝）

1. 武經總要 2. 研究考訂

011.08

101015062

ISBN-978-986-254-990-2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五編 第七冊

ISBN：978-986-254-990-2

《武經總要》研究

作 者 李新偉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2 年 9 月

定 價 十五編 26 冊（精裝）新台幣 4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武經總要》研究

李新偉 著

作者簡介

李新偉，男，1976年生，河南漯河人，史學博士，軍事學博士後。武警北京指揮學院講師，兼任中國歷史文獻學會會員、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會員、濱州學院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古代軍事文獻、軍事思想。先後在《軍事歷史研究》、《軍事歷史》、《國立國家圖書館學刊》（臺北）等發表論文二十餘篇，出版著作一部，主持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一項、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兩項。

提 要

宋仁宗年間，北宋與西夏爆發了激烈戰爭。當時，「王師出伐」，卻屢敗於「蕞爾小邦」。究其原因，宋仁宗等人認為主要是將帥昧於古今之學，因而專設書局，特命丁度總領，曾公亮、楊惟德等人編纂了《武經總要》一書。

該書作為中國古代第一部官修大型綜合類兵書，可圈可點之處甚多。首先，真正創立了中國古代綜合類兵書的編纂體例，不僅設置比較全面、合理，還存有大量繪圖，文圖並茂。其次，作為北宋以前兵學的系統總結，體系十分宏大，四十卷（一說四十三卷），洋洋灑灑 50 餘萬字，「凡軍旅之政，討伐之事」，無不載記，內容十分豐富。複次，注釋內容全面廣泛，注釋方法多樣、系統，義理考據兩不偏廢。最後，反映了一些先進的思想文化理論。在軍事方面，儘管以匯總為主，但也包括了許多值得稱道用兵作戰思想；在科技方面，許多內容代表了宋代科技發展的最高水準，甚至有些還是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科學發現。

當然，該書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現在內容不精，引注不清；文人論兵，書實相脫；雜含陰陽，弊多利少。然則，瑕不掩瑜，它不僅對當時軍事教育和國防力量的加強起到一定作用，引起了文人論兵的熱潮，同時還被歷代兵家奉為經典，多加襲用，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目 次

緒 言	1
一、選題意義	1
二、學術界研究概況	3
三、研究方法及創新點	7
第一章 纂修背景	11
第一節 時代背景	11
一、周邊安全形勢	11
二、國內狀況	14
三、宋夏戰爭	17
第二節 學術環境	19
一、學術文化的繁榮	19
二、文獻學的發展	22
三、兵學的寥落與復興	25
第二章 纂修人員考	31
第一節 曾公亮	31
一、家世	31
二、宦跡	33
三、軍事	37
四、文化	41
五、曾公亮與《武經總要》的纂修	45

第二節 丁 度	49
一、家世	49
二、宦跡	50
三、軍事	54
四、文化	57
五、丁度與《武經總要》的纂修	61
第三節 其他修撰者	64
一、楊惟德	64
二、朱竊	67
三、王質	69
四、其他未載者	70
小 結	71
第三章 纂修時間考	73
一、諸說紛爭	73
二、纂修者官職	78
三、地理建置	81
小 結	90
第四章 版本源流考	93
第一節 宋 本	93
一、祖本	93
二、紹定刻本	95
第二節 明 本	96
一、刻本	96
二、抄本	111
第三節 清以來版本	120
一、舊本	120
二、新本	125
三、電子版本	126
第四節 結 論	127
一、版本內容複雜	127
二、版本鑒定困難	128
三、卷數情況	129
四、古籍書目、兵書書目之誤較多	131
五、古籍散失嚴重	132
附：《武經總要》版本源流圖	134

第五章 纂修體例考	135
一、設置全面	137
二、編排合理	143
三、結構精當	148
四、圖文並茂	152
五、缺失與不足	154
小 結	155
第六章 文獻價值論（上）——輯佚學價值	157
一、兵書的輯佚與補遺	159
二、其他典籍的輯佚與補遺	182
餘 論	186
第七章 文獻價值論（下）——注釋學價值	189
一、注釋內容	190
二、注釋方法	196
三、注釋模式	207
四、注釋優缺點	211
第八章 思想文化論	219
第一節 軍事思想	219
一、選用將帥	219
二、軍事訓練	221
三、營陣規制	223
四、攻守方略	224
五、其他方面	226
第二節 科技文化	233
一、火藥	233
二、指南針	238
三、密碼學	241
四、醫學	242
五、地理學	243
六、天文曆法	244
結 語	249
附錄一	255
附錄二	261
主要參考文獻	265
後 記	279

緒 言

一、選題意義

兵書，是以文字或圖畫記錄古代軍事知識的書面載體。作為軍事文獻的主體，它既是古代軍事學術研究成果的結晶，又是今天研究軍事學術史的重要資料，因為每個時代兵書的數量、質量與內容都反映了當時軍事學術研究水平。

中國古代兵學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大階段，即萌芽與產生時期（殷商至西周）、成熟與發展時期（春秋至隋唐）、興盛與衰落時期（宋元至明清）。宋朝，尤其在北宋仁宗以後，是中國古代兵書發展的關鍵時期之一。當時由於西夏和遼的崛起，特別是在與「蕞爾小邦」西夏的交戰中連連敗績，迫使宋廷不得不重新重視軍事。其具體表現之一就是，宋仁宗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動用國家力量修纂了《武經總要》，並親自作序。

由於歷代朝廷對兵書控制均十分嚴格，許多兵書被束之於高閣，秘不示外，所以對兵書的整理和研究不但十分有限，而且有限的成果也未得到應有地傳播。在當今世界新軍事變革如火如荼展開之時，在掀起有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浪潮中，理論創新顯得尤為重要。但真正的創新絕不是單純意義上對國外高科技產品的因襲，因為人類戰爭的歷史反覆證明，戰爭不僅是裝備與技術的較量，更是交戰雙方軍事理論、戰略思維的對決，先進的軍事理論永遠是克敵制勝的法寶。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軍隊的現代化就是軍事理論的現代化。軍事理論創新涉及內容很多，範圍極廣，其中就不乏中國古代歷史上經典作家留下的不朽之作——兵書。只有對這些以兵書為中心的古代軍事文

獻進行全新「改造」，緊緊圍繞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這一中心，有針對性地對那些長期起作用的傳統理論，在繼承中注入新內容、賦予新內涵，才能創造出符合新軍事變革潮流的全新軍事理論，走出當前理論上「全盤照抄」的替代式誤區，真正堅持「師夷長技」與「立足自我」相結合。因此，對兵書加大整理和研究力度，從中吸取精華，補充有效營養，顯得尤為迫切。

軍事學作為一門綜合性很強的交叉型學科，包含了眾多專業知識。所以作為古代軍事學術的主要載體——兵書，其內容不僅涉及古代軍事領域的各個方面，還包含其他學科的豐富內容，具有多方面價值。而《武經總要》作為一部綜合類兵書，尤其如此。在創新軍事理論迫切需要的同時，相關學科，特別是文獻學的發展也有著同樣強烈的願望，要求對《武經總要》加以系統整理和研究。

具體說來，《武經總要》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著錄體例上看，研究《武經總要》對於整體認識中國古代兵書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是中國古代第一部大型綜合類兵書，也是我國第一部官方主持編纂的兵書。唐代李筌的《太白陰經》是中國古代最早初具綜合性質的兵學著作，繼之者有北宋初期許洞的《虎鈴經》，但動用國家力量編纂大型綜合類兵書則始於《武經總要》，全書共四十卷（一作四十三卷），這是前兩者所無法企及的。明代王鳴鶴的《登壇必究》、茅元儀的《武備志》正是在該書基礎上不斷加以完善、充實的。可以說，《武經總要》是中國古代綜合類兵書體例的真正鼻祖。

第二，從文獻學角度看，《武經總要》兼收並蓄，保留了不少有關校勘學、注釋學、音韻學的相關內容。它選擇不同版本的資料進行校勘，擇優吸納，並對疑而未決者並存之；許多注文簡單明瞭，極為實用；在音韻方面保存了一定量的中古音系資料。這些對於文獻學研究均有一定意義，特別是對於一部兵書來講這是極為難得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也體現了宋朝「文人論兵」的特點。

第三，從軍事歷史角度看，《武經總要》「前集備一朝之制度」〔註1〕，較完整地保存了北宋前期的軍事制度；「後集具歷代之得失」〔註2〕，「采春秋以來列國行師制敵之謀，出奇制勝之策，並著於篇」〔註3〕，保存了大量古代實

〔註1〕 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九，《武經總要》。

〔註2〕 同上。

〔註3〕 曾公亮《武經總要》，《後集原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戰資料。這些對於研究古代兵法、唐宋兵制和歷代戰史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

第四，從軍事思想上看，《武經總要》的編纂反映了宋初至仁宗時軍事思想的變化。在血的教訓面前，它開始部分否定宋太祖、太宗以來的保守軍事思想，重新肯定了「兵知貴變」這一優秀傳統；重視將帥的選拔和使用，指出「君不擇將，以其國於敵也」〔註4〕；重視軍隊的訓練，堅決反對「不習之過」；重視賞罰，具體各種「賞格」、「罰條」，以求「申賞罰以一其心」〔註5〕等等。這對於今天軍事變革的各個方面均有一定借鑒意義，尤其是對軍事作戰等方面有較大啓迪作用。

第五，從科學文化史上看，《武經總要》對邊防地理的記載相當詳細，其中曾提及派軍艦到「九乳螺洲」（今西沙群島）巡邏，為今天維護祖國領土完整和主權提供了無可辯駁的歷史依據。另外，它還一改過去「重道輕器」傳統，記載了豐富的古代科學資料，尤其是古代武器裝備的製造技術資料，不單單勾劃出自南北朝、隋、唐、五代傳襲而來迄宋持續發展的武器形象輪廓，還涉及了物理學、磁學、聲學、化學、地理學、天文學、醫學、密碼學等各學科專業知識。其中有些方面代表了北宋前期科技水平，有些記載則是當時世界第一流的發現，難怪著名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先生在《中國科技史》中對其褒獎不已。

二、學術界研究概況

關於《武經總要》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古今學者論述頗豐，下面分門別類的就其主要內容進行概括歸納。

第一，關於《武經總要》的纂修人員。

傳統說法認為，參與《武經總要》纂修的人員主要有曾公亮、丁度、楊惟德三人。但關於曾公亮、丁度署名先後的問題有不同看法，歸結起來主要有兩種。一種認為，曾公亮具體負責，組織編寫，應居於首位；丁度把握全局，提綱挈領，居於其次。另一種認為，真正主持並參與該書編寫工作的是丁度；曾公亮在當時祇是「官高位顯」，過問此事而已。持前一種觀點的人，目前占多數，其中尤以毛元祐的《〈武經總要〉署名及成書時間考辨》、姜勇的《〈武經總要〉纂修考》等論文最為突出，考訂最細；持後一種觀點的人，

〔註4〕 曾公亮、丁度等《武經總要》前集，卷一，《選將》，中國兵書集成本。

〔註5〕 曾公亮、丁度等《武經總要》前集，卷二，《教條十六事》，中國兵書集成本。

以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閱覽室和劉雲柏的《中國兵家管理思想》一書爲代表，其中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閱覽室把明刻本《武經總要》署爲丁度一人所著。

除了上述三人外，今人認爲參與《武經總要》纂修的還應該有其他人。姜勇在其《〈武經總要〉纂修考》一文中認爲還有朱宋、歐陽修等人，毛元祐在其《〈武經總要〉署名及成書時間考辨》一文中認爲還有朱宋、王質等人。

第二，關於《武經總要》的纂修時間。

關於《武經總要》纂修時間這一問題分歧比較大。傳統說法認爲，起於康定元年（1040）或康定二年（1041）止於慶曆四年（1044），歷時五載。有關史籍記載與後世論著多依此說，諸如宋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元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清紀昀的《四庫全書總目》，今人工具書《辭源》、《中國大百科全書》，時人論文朱少華的《〈武經總要〉的軍事倫理思想》、劉福鑄的《論〈武經總要〉的科技史價值》等，均是如此。當然，其間也有不少學者做過質疑，主要有清人錢大昕及今人毛元祐、張其凡、姜勇等人。他們觀點具體不一，其中毛元祐在《〈武經總要〉署名及成書時間考辨》中認爲始於慶曆三年（1043）十月，止於慶曆六年（1046）八月至慶曆八年（1048）四月之間，編纂至多用時四年半；張其凡在《〈武經總要〉編纂時間考》中認爲始於慶曆三年（1043）十月，成於慶曆七年（1047）四至六月間，整個過程歷時五年，實際用時三年半；姜勇在《〈武經總要〉纂修考》中認爲纂修時間應起於慶曆三年（1043）十月，止於慶曆七年（1047）四至六月。綜合起來，《武經總要》纂修時間主要界定於慶曆三年（1043）十月止於慶曆六年（1046）至慶曆八年（1048），目前從此說者已漸多之。

第三，關於《武經總要》的版本源流。

對於《武經總要》版本的研究，主要有許保林的《中國兵書通覽》、謝祥皓的《中國兵學》、中國兵書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的《中國兵書集成》中的《武經總要》編輯說明、中華書局編輯的《中國古代科技圖錄叢編初集》中的《武經總要》前集後記等。許保林的《中國兵書通覽》、謝祥皓的《中國兵學》對《武經總要》的版本情況簡單加以介紹。中國兵書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的《中國兵書集成》中的《武經總要》編輯說明將《武經總要》分爲兩個版本支系，即四十卷本與四十三卷本，有著較爲詳細地論述，且對不同時代的刻印情況，尤其是明代正統刻本、嘉靖刻本、弘治刻本進行了簡單考查與鑒定。中華書

局編輯的《中國古代科技圖錄叢編初集》中的《武經總要》前集後記對明正統刻本與四庫全書本進行了一定評述。文中認為，明正統四年刻本應為明正德年間刻本；四庫全書本版本缺點較多，主要有四點：「一，所舉底本，中有缺葉（頁），不加說明，妄事連輟；二，庫本通病，擅改擅刪宋人著作中的北虜、匈奴字樣，同樣也發現在本書中；三，鈔（抄）寫錯誤，或以意為之，以致形成混亂；四，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即庫本插圖大失原意。」

第四，關於《武經總要》的軍事思想。

這一問題是軍隊學者論述《武經總要》的主體。相關著作較多，主要有劉雲柏的《中國兵家管理思想》、金玉國的《中國戰術史》、姜國柱的《中國軍事思想簡史》、許保林的《中國兵書通覽》、謝祥皓的《中國兵學》、中國軍事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軍事史》第四卷等。其中劉雲柏的《中國兵家管理思想》一書對《武經總要》的兵家管理思想進行了較為簡單的評說，認為它綜合了北宋以前重要的兵家管理理論，是探討我國兵家管理思想的重要資料。金玉國的《中國戰術史》一書從戰術角度對《武經總要》所載「常陣」、「平戎萬全陣」、「本朝八陣」等戰陣進行了簡要評述。姜國柱的《中國軍事思想簡史》、許保林的《中國兵書通覽》、中國軍事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軍事史》第四卷等相關著作對《武經總要》的軍事思想進行了綜合評價。謝祥皓的《中國兵學》則認為「《武經總要》一書並不是一部具有相當理論高度的兵學思想專著，然而卻是一部在當時指導戰爭實踐的百科大全」（註6）。

此方面論文主要有朱少華的《〈武經總要〉的軍事倫理想》。該文主要從《武經總要》主張「用兵之道以仁為本」、「以殺止殺」、「以戰止戰」；強調將帥的德行修養；堅持以法治軍，以法養德；重視軍隊的訓練教習，尤其是氣勢上的培養等方面對其軍事倫理思想進行了較為詳細地剖析。並且，還進行了較為允妥地評價，認為《武經總要》推動了中國古代軍事倫理學的發展，為軍事倫理學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在軍隊道德建設觀念上有一定開拓。

第五，關於《武經總要》的科技史價值。

關於《武經總要》的科技史價值，論述者較多。相關著作主要有王兆春的《中國火器史》，周緯的《中國兵器史稿》，中國軍事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歷代軍事工程》、《中國歷代軍事裝備》以及《中國軍事史》第一卷等。主要論文有王兆春的《試論〈武經總要〉中的軍事技術問題》與《從〈武經總

〔註6〕 謝祥皓《中國兵學·宋元明清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0頁。

要》看宋初的火藥和火器》，劉福鏄的《論〈武經總要〉的科技史價值》，薄忠信的《〈武經總要〉與物理學》等。

其中周緯的《中國兵器史稿》、中國軍事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歷代軍事裝備》及《中國軍事史》第一卷、王兆春的《試論〈武經總要〉中的軍事技術問題》主要講解了《武經總要》所載宋代各種兵器，並從自然學科理論高度簡單論述了其製造原理，認為明清諸代之兵器多脫胎於此，指出此「其圖形之所以為貴也」。中國軍事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歷代軍事工程》及王兆春的《試論〈武經總要〉中的軍事技術問題》對《武經總要》所載相關軍事工程、軍事技術有一定述論。

王兆春的《中國火器史》和《從〈武經總要〉看宋初的火藥和火器》比較詳細地對《武經總要》中的三個火藥方進行了論述。劉福鏄的《論〈武經總要〉的科技史價值》，薄忠信的《〈武經總要〉與物理學》主要從物理學、化學、數學、天文學、冶金學以及密碼學等方面論述它在科技史上的價值。這當中，尤以《武經總要》物理學方面價值論述較為集中，對其在力學、聲學、磁學、熱學等多個分支學科方面的貢獻均有一定闡述，特別是對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火藥和指南針有著較為深刻的論述。這對於評價《武經總要》在物理學及其相關學科方面的價值，乃至相應評價北宋科學技術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地位，都有較為重要的作用。

從目前研究現狀可知，對《武經總要》的研究尚存在如下問題：

首先，比較片面。上述研究主要集中於《武經總要》的纂修、軍事思想、科技史價值上，對其他方面涉及不多。事實上，《武經總要》作為中國古代第一部大型綜合類兵書，從形式到內容可供研究的領域相當多，比如它的版本源流、著錄體例、輯佚學價值、注釋學價值等許多領域均很有意義，但目前尚無人對其進行專門研究。而且就目前所論的三個方面來講，也存在此種問題，纂修人員主要討論曾公亮、丁度二人與《武經總要》的關係，別的基本未加涉獵；軍事思想主要論述主流保守思想，而對許多優秀的用兵作戰思想卻忽略不見；科技史價值則主要集中於三個火藥配方上。

其次，不夠深入。就現有研究成果來講，僅有專業論文 8 篇，其中關於《武經總要》纂修 3 篇、軍事思想 1 篇、科技史價值 4 篇。以《武經總要》纂修時間考證為例，大多祇是單純從曾公亮、丁度的任職上來考定起止時日，並無從其他角度進行多方位的佐證。而軍事思想的論述多侷限於宋代軍事思

想史，或者至多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史，並未與當今軍事相關內容結合進行研究。至於科技史方面祇是從表層探討文獻記載的價值，並未真正跨學科從深層次進行專門系統論述。

再者，不夠系統。從上述兩點中可以發現，現有研究成果中，就已所論及的問題本身而言，大多支離破碎，無系統性可言；至於對《武經總要》的整體研究，目前還尚未展開，也沒有專著問世，更談不上系統。

最後，訛誤較多。現有研究成果中錯誤較多，如劉雲柏的《中國兵家管理思想》中不但把《武經總要》纂修時曾公亮的任職誤書為「樞密使」，在論述武學教材時還竟把《武經總要》當做《武經七書》來論述，認為《武經總要》是宋以來武學的「基本教材」。又如《中國軍事史》第四卷中也誤認為曾公亮在作《武經總要》時所任之職為樞密使，張欣毅、丁力撰寫的《跨越時空的文明》（五）中則把《武經總要》成書的時間錯置於《武經七書》之後。再如吳九龍的《孫子校釋》與楊炳安的《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在引用《武經總要》卷一「將職」條目中的「夫善用兵者，能愚士之耳目而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知，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以及卷十一中的有關內容時，由於沒有考訂版本而多次造成誤斷。

三、研究方法及創新點

本書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採用計量史學方法進行定量統計、分析，運用博弈論尤其是軍事博弈論理論，融合其他相關理論，採取多學科交叉的方法進行綜合研究。不僅注意運用軍事學的相關理論進行研究，諸如戰略學、戰役學、戰術學、軍制學、軍事哲學、軍事指揮學、軍事情報學、軍事密碼學、軍事醫學、軍事地理學、軍事歷史學等。同時，還注意運用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注釋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等知識進行研究，並汲取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磁學、聲學、美術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試用於具體寫作。從探討纂修背景論起，運用上列諸法全面展開研究，糾過去之謬誤，解以往之分歧，探討未被涉獵的處女領域，評述北宋前期軍事概況，服務於當今新軍事變革。

本書出現的創新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引進新理論。

本書大量引進新理論開展研究，主要有計量史學（歷史學的計量方法）、

博弈論、廣義校勘學等。

歷史學的計量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 of History），是指把數學方法特別是數理統計方法對歷史資料進行定量分析，進行歷史研究的一套方法。它有助於把傳統史學中常見的定性論斷中隱含的模糊數量判斷明晰化，從而對那些包含模糊數量判斷的定性論斷加以驗證，或予以確證，或加以修正，或予以否定，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新的論斷。本書在版本、著錄體例、輯佚、注釋等方面的研究中進行相關定量分析，排除了不必要的模糊概念，避免錯誤判斷的出現，使論述更加精確化，結論更準確、更具說服力。

博弈論（Game Theory），是一種關於決策和策略的理論。它被廣泛應用於經濟、軍事、政治、人工智慧、生物、火箭工程技術等領域。運用於軍事領域就成了軍事博弈論，目前國內對此研究及應用者極少。所謂軍事博弈論就是一種以定量方法研究謀略博弈規律的科學，實際上也是一種研究軍事博弈中術、數關係的學問。它分為完全資訊下靜態軍事博弈、完全資訊下動態軍事博弈、不完全資訊下靜態軍事博弈、不完全資訊下動態軍事博弈、重複博弈、聯盟與談判博弈等不同情況。本書在對相關軍事思想進行分析時，尤其是軍事戰略、戰術和軍事管理等進行分析時採用此法，為優秀的兵學思想提供理論支撐，為現代戰爭提供有益啟示。

另外，本書還引進了李零先生所說的一種類似考古標型學〔註7〕的校勘學方法，替代了傳統校勘學所習慣採用的那種單純堆積版本和考覈字句異同的方法。這實際上是一種擴大的校勘學。其內容並不限於考覈字句異同，像出版校對一樣，祇是一種純技術工作；所追求的也絕不是「取各本之長」拼湊成一個所謂最完善的本子。它不再是一種「平面的」處理方法，而是一種從發生層次上兼顧縱、橫兩面，帶有歷史比較性質的方法。這種方法通過對研究對象不同時期各種版本資料按序列排隊，不僅可以理清校勘方面的發展線索，亦可做各種版本歸併。

其二，進一步豐富纂修人員資料。

本書不僅對《武經總要》的主要纂修者曾公亮、丁度進行較為詳細的描

〔註7〕 考古標型學就是考古類型學，有時也稱之為器物形態學。它是一種科學地歸納、分析考古資料的方法論。它根據遺物所處的地層進行反復排比，來獲知其形態演化的規律，並藉以推知其相對年代。同時，通過對不同遺址器物的比較研究，還可以瞭解不同地區間文化聯繫的性質和程度。

述，而且還盡可能地搜集了其他纂修者，如楊惟德、朱棣、王質等人的相關資料，使對纂修人員的論述更加飽滿。同時，還對曾公亮、丁度二人在《武經總要》纂修中的具體地位與作用展開全面探討，以解諸家之紛紜。

其三，多角度進行纂修時間考證。

本書一改前人單一論述的傳統方法，以《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史籍明載《武經總要》纂修時間為基礎；以《武經總要》所錄具體內容，諸如路、州、軍、堡、寨的設置與變更等為依託；以纂修者具體任職情況為佐證；輔以相關兵書纂修起止時間，從多角度進行全方位考證，考明該書的纂修時間，得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

其四，更加全面展開版本考證。

本書廣泛搜集國內外現存《武經總要》的各種版本（目前所知共 31 種），分為宋本（已亡）、舊本、新本三大類，從目錄書籍記載，實際所見卷數、封面印記、刻印源流、章藏印記、行款版式、款式題跋、用紙、墨色、字體、刀法以及所存目錄與部分正文內容等方面考證其源流和優劣情況，特別是對眾說不一的版本斷識和前人一直未加注意幾種版本，如《永樂大典》本等尤加詳考，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同時，還對所有《武經總要》的版本情況進行綜合歸納，論述其版本內容複雜性、版本鑒定困難度、卷數流傳交叉性，以及古籍書目、兵書書目之誤載、漏載、載異、載無等情況，從而對《武經總要》的版本情況由表及裏，由淺入深，進行深層次的研究。

其五，首開著錄體例評價。

本書主要從兵書史上評述《武經總要》的著錄層次與著錄體例。首先，梳理兵書著錄體例的發展歷程：先秦兵書多理論、謀略，後漸有戰術層次方面內容，至《武經總要》時中國古代第一部大型綜合類兵書才真正問世。之後，對後世兵書沿襲其體例，尤其是明代幾部重要兵書的襲用與完善，進行細分詳解。同時，更進一步注重從深層原因上剖析此種體例出現並加以沿革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從而比較全面地評價《武經總要》在兵書著錄體例史上的地位。

其六，更多開創文獻學價值。

除了引用上述所說的廣義校勘學的理論之外，本書還在前人的基礎上對科技史料價值進一步挖掘，重點是開前人之未開、發前人之未發；從文獻學的輯佚價值、注釋學價值等方面來研究《武經總要》。特別是本書以《孫子》